**陆学艺粮食问题研究**

杨桂宏

内容摘要**：**持续三年的新冠疫情叠加地缘政治冲突，粮食安全再一次成为全球关注的话题。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近年，中国粮食生产机会成本上升，种粮亏钱，隐性或显性土地抛荒现象出现。那么如何调动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 本文通过对陆学艺相关文献研究，发现他把促进粮食生产与农民的利益紧密结合，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调整社会群体利益结构和国家宏观发展战略视角来研究粮食问题，保障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陆先生粮食问题研究的发展观、协调观和全局观对新时期制定适宜的粮食安全政策有着非常重要启示作用。

关键词**：**陆学艺；粮食安全；启示

  **引言**

新冠疫情叠加地缘政治冲突，粮食危机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3月份以来，国际粮食价格同比上涨12%以上，创下10年来新高，全球粮价上涨会使数以亿计的人口陷入贫穷和饥饿的境地。俄乌冲突，使占世界小麦出口30%、玉米出口20%的世界两大粮仓农业生产基本停顿，全球粮食安全问题亟待引起更多重视并加以解决。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不止一次警告，疫情和战争可能引发一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粮食进口国人民的饥饿问题，人类将面临“二战后最大的粮食危机”。我国作为粮食紧平衡国家，自给粮食存在结构性矛盾。2019年我国从国外谷物净进口1468万吨，主要是强筋、弱筋小麦、泰国大米等，目的是为了调剂需求结构，满足人们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1]](#footnote-0)因此，“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总书记嘱托在新时期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回顾和总结一直为国家粮食安全殚精竭虑的陆先生的粮食安全思想，也许会有特殊的时代意义。

粮食问题研究是陆先生一生所系的学术命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是不拿农口工资，为农口打工的研究员”，也是他秉持“做学问就是要解决问题”学术信仰的忠实践行。从1978年10月初他在新华社内刊发表的《关于加速农业发展的若干政策问题》直到去世前2013年2月27日在经济日报发表的《把东北平原建成中国未来的大粮仓》，对中国粮食问题研究贯穿陆先生的整个学术生涯。不论是在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从事农业经济研究，还是在社会学所从事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建设研究，粮食问题一直是他尤为关注的主题。30多年来，陆学艺每到一地，不论是公务还是私务，也不论是进行何种主题的社会调查，他都必定挤出时间到农村去，到农民家里去，找当地农村干部和老乡聊一聊，了解农业生产情况、粮食产量、以及农民收入等问题。如他谈到“近几年，我到各地农村去调研，听老农民、老村干部忆古论今，从东到西，从南到北”。[[[2]](#endnote-0)]倾听农民的声音，是他研究粮食问题的主要思想源泉。

一、调动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是陆先生粮食问题研究的核心

与大多技术派的粮食安全研究不同，陆先生作为社会科学家，他研究粮食问题，一直是围绕是粮食生产者--农民这一主体，针对不同时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从如何保护农民的利益出发，调动他们粮食生产的积极性，来进行政策建议和问题分析的。

（一）包产到户，激励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

在改革开放之初，他从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着手，调动农民农民粮食生产的积极性，积极推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全国人民吃饱饭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改革以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割农村资本主义尾巴，没收自留地，限制家庭副业等举措使农村农业生产长期徘徊停滞，粮食生产不能满足基本温饱需求，陆先生基于这个事实开始关注粮食生产。如何提升粮食产量满足全国人民吃饭问题，陆先生以学者的担当和勇气，在改革开放之初打破意识形态的压力，大力推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调动农民粮食生产的积极性，解决人民吃饱饭问题。

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意识形态还主导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背景下，“包产到户”是受到种种非议和政治压力的。但是，他通过安徽肥西县山南区农业生产实地调查，基于不同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对粮食产量影响明显的现实，于1979年9月撰写《包产到户问题应当重新研究》一文，引起中央的注意。1980年，他又通过甘肃38天实地调研，撰写《包产到户的由来，今后的发展》调研报告。陆先生农村包产到户调研报告在当时全国上下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积极推动了国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此后，中央连续发布一号文件，以“推行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使用权分离，使农民成为经营主体，从而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大增产。”[[[3]](#endnote-1)]面对农村形势一年比一年好，农业连续6 年大丰收。在学术理论上，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合作理论进行中国化的运用，1984年，他和张晓明在《哲学研究》上共同发表《马克思主义的合作理论和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文，对此进行了学术理论化的梳理。[[4]](#footnote-1)﹡ 为了解决全国人民吃饱饭的问题，陆先生冲破意识形态的束缚，把粮食生产与农业生产组织形式联系起来，调动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增加粮食生产与供给。

（二）反弹琵琶，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1985年我国粮棉突然大减产。一种观点认为粮棉减产是计划安排的，表明农业发展“超常规增长转入常规增长”，不必过虑。但陆先生发表《农业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一文，明确提出“不能小看这次减产，对农业不能掉以轻心，根据我在农村蹲点调查的见闻，认为1 9 8 5年减产不是偶然的，当前农业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农村的自然经济正在向商品经济转化，但流通体制改变甚小，农民买难卖难的问题有增无减。”“长期的买难卖难直接打击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也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5]](#endnote-2)]该文引起了邓小平的重视，并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说：“农业生产水平降低，中国农业将进入新的徘徊时期。这是值得注意的。”如此可见，对于增产几年后的突然粮食减产，陆先生敲起了安全警钟，并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认同。

长期以来，农民工的就业流动一直受城乡比较收益的影响。城市打工机会多，收益大，就选择进城打工。于是留在农村种地的人少了，土地抛荒现象出现，粮食减产。如陆先生谈到：“农业形势严峻的最主要方面是农民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农民不爱种田，特别是不爱种粮食，……本来可以种两熟的，现在只种一熟，……本来可以套种间种增产的， 农民为了省出时间去挣钱，也不间种套种了。”[[[6]](#endnote-3)]这样一来，粮食价格势必上涨，农村种地有一定的收益，一部分农民工又选择回乡种地。所以，粮食市场价格的调整机制就是粮食产量上下波动，粮食价格不稳定，不能与国民经济增长同步上涨。对于粮食生产不稳定，陆先生认为“解决农业问题，不仅是农村能否提供足够的粮食、棉花等农产品的问题，而要同时解决农民问题，粮食棉花都是农民种的，农民自身的问题不解决，没有积极性，田是种不好的。”[[[7]](#endnote-4)]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所占比例不断下降，农民工回乡种地获取收益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小。因此，他明确指出：“现在的农业问题，主要不在农业本身也，不在农村内部，所以要解决农业、农村问题，就要着力去发展农村工业，发展第三产业，就要着力去发展城市加速推进城市化的进程。”[[[8]](#endnote-5)]陆先生的“反弹琵琶，加快城市化”是通过逆向思维，减少农村土地耕种者，提升种地农民相对收益，进而激励他们的种粮积极性。由此可见，陆先生的粮食问题研究是和粮食生产主体—农民的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从维护农民利益，解决农民问题来寻求解决国家粮食问题的。

（三）再次倡导家庭农场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励大小农场两个积极性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二三产业就业机会增多，使农民工返乡务农的频率下降，粮食价格也随着产量减少而上涨。如1995年，中国粮食价格猛涨，直接影响到城镇中下层收入特别是贫困人口的日常生活，引起社会的不安。陆先生认为：“这次市场粮价陡升 ，粮价暴涨，说到底还是由于粮食有效供给不足引起的。”[[[9]](#endnote-6)] 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中国作为制造业外贸出口大国，农民外出打工收入远超务农，粮食生产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机会成本。尤其是城市化的推进，户籍制度的松动，农民工城市就业权益逐步得到保障，社会保障权益，享有子女受教育权等城市生活的平等公共服务权益等都促使年轻的农村劳动力放弃农业。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小农粮食生产与国外农业补贴政策加上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技术相比，其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弱，从国外进口粮食又便宜又好。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调动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2012年，陆先生深入黑龙江农垦总局调研，明确提出要把东北平原建成中国未来的大粮仓。2012年“全国粮食大丰收，黑龙江立了头功”，而黑龙江省粮食九连增起关键作用的是黑龙江农垦总局。为何农垦总局能够在全国粮食生产中脱颖而出，主要“在于1995年他们按照中央和省委的指示，重启体制改革，再次推行家庭农场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两自（生活费用、生产费用自筹），四到户（土地、农机、经营核算、盈亏自负）。从此，把家庭农场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同时实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大农场这边主要做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大田作业，实行统耕、统种、统灌、统管（治虫、施肥）、统收、统销（售），做到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统分结合。这样就使小农场和大农场的两个积极性都得到了充分发挥。”[[[10]](#endnote-7)]对此，他还特别提出要总结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普适应，看能否找到在农村推广的方式和方法。由此可见，陆先生对“四到户，两自理”和“六个统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新时期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充满信心。

二、社会结构调整是陆先生解决粮食问题的主要策略

 社会结构是社会各群体间的利益关系结构。粮食问题涉及与粮食生产、储存、流通、买卖等产、供、销多个环节相关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平衡和关系调整。不同时期，面对粮食丰收与欠收，各主体会为维护自身利益，在政策允许范围内不断调整自己处理粮食相关业务的社会行为。而作为一个粮食系统，一方调整行为必然影响其他主体的利益，也必然带动其他主体调整自己的行为，这就是利益主体间利益博弈。在计划和市场不同体制下，多方利益群体调整自己的行为都会对粮食生产带来影响。因此，国家应根据具体形势，调整相应的农业政策，保障粮食自给。

（一）计划体制下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结构调整

计划体制下，陆先生研究粮食问题主要从调整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来提出政策建议的。在改革开放后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与粮食问题密切相关的利益主体主要是国家与农民。国家作为政府，要保证全民的粮食供给；而农民作为粮食的主要生产者，更想通过种粮来获得更多收益。因此，利益关系的调整与博弈主要在二者之间展开。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几年后，粮食连年丰收，农民收入增加，国家面临的粮食问题不再那么紧迫，于是国家与农民间利益博弈通过税费和贷款等方式展开。如1985年粮食大减产，“据调查，现在农村的负担大多数地区都是按人头摊派，不分男女、老少、贫富，每人50多元(多者达百元) , 每户就是200一300元。有的上交后，生活成了问题，更多的是影响生产的投入没有钱买化肥农药。”“供销体制基本格局未变，少了赶，多了砍的政策未变，官商经营作风未变，致使亿万农民望市场兴叹，面对瞬息变化的商品信息，他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近几年农业贷款增加不多，特别是去年国家紧缩银根，首当其冲的是大量压缩了农贷，……出现了国家收购粮棉不给现金打白条，农民到信用社提取存款拿不到钞票。”[[[11]](#endnote-8)]因此：陆先生建议保障粮食生产，“要正确处理好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农村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但是我国农业的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农民的家底还很薄，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我们办工业，办一切事业都要考虑到这个基本国力，考虑农民所能承受的能力，切莫使农民负担过重……”[[[12]](#endnote-9)]“正确的总结历史经验，及时制定好合理正确的农业政策，保护好农民的利益，调动广大农民务农种粮的积极性，中国农业的潜力还大得很，中国农民的潜能还大得很，农民真正愿意种田种粮了，加上有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和现代农业生产资料的投人，中国的粮食供给是不会有大问题的，靠中国的农民养活中国是有把握的，中国的农民是靠得住的。”[[[13]](#endnote-10)]

（二）市场体制下的利益群体结构调整

市场体制下，粮食问题关系利益群体更为多元，既有粮食生产者，也有粮食消费者；既有粮食输出地，也有粮食输入地；既有保障粮食安全的储备部门，也有粮食经销的商业部门。这些不同的利益群体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面对不同粮食丰欠不同形势，其利益是各不相同的。因此，陆先生强调“从历史经验来看，要使粮食生产稳定发展，要协调好生产者、消费者、经营者、地方、中央这几个方面的利益关系。”“粮食之所以能持续增产，这五个方面的利益关系都比较平衡、协调，……之所以没有能持续增产下去，都是因为平衡、协调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没有及时调整，导致农民利益收到损失，粮食生产积极性受挫，粮食就减产了。”对于粮食生产者--农民，他认为如何调整粮食生产资料—种子、化肥、农药等涨价问题，同时如何稳定“提高粮价，并使提价能够惠及亿万粮农，是当前要研究解决好的大问题。”对于粮食消费者--城镇市民，由于收入逐步提高，粮食在城镇居民消费中所占比例逐步降低。他谈到“1984年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城镇居民的粮食支出占生活费支出的11.28%，占城镇居民收入的9.6%。2007年，城镇居民的粮食支出占生活消费出的7.2%，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5.2%。”由此可见，粮食价格在消费端来看是由增加空间的。从粮食流通体系看，他认为一直并不顺畅。目前看粮价“高了，粮农得不到实惠，被粮食的买卖人得了；低了，直接损害粮农利益，打击粮食生产。”从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来看，他建议“要制定主销区对主产区经济补偿的政策，例如：每调出1亿斤粮食，调入省要给主产区一定的补贴；中央政府要对调出区以补贴和奖励，以调动地方政府主动抓粮食生产的积极性。”[[[14]](#endnote-11)]由此可见，陆先生在研究粮食问题是从相关利益群体关系视角，从平衡各群体间的利益结构来进行政策建议。

（三）城市化背景下的区域结构调整

 随着农村改革不断深入，国家大力倡导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试图通过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实现农业发展的现代化和集约化。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布局、市场观念以及人地关系等南北方不同，我国粮食生产结构在这种情势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清前一直以来流传的“湖广熟，天下足”，到2011年已经转变为“东北熟、天下足”。多年来，我国一直通过漕运方式南粮北运。所以在人民的观念中，南方是我国粮食的主产区。1985年，湖广五省区[[15]](#footnote-2)粮食产量占全国20—23%，东北四省[[16]](#footnote-3)的粮食产量只占全国产量的11-13%；但是到2012年东北四省的粮食总产量超过1.44亿吨，占全国总产24%，湖广五省区粮食虽然也是增产的，但占到全国比重将下降到14%。[[[17]](#endnote-12)]鉴于我国粮食生产结构的南减北増的趋势，陆先生建议调整农业生产布局。他认为：“中国粮食的主产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高速发展，二、三产业都很发达，目前工业化还在继续发展，正处于城市化高潮之中，不仅会继续占用大量耕地，而且还会继续扩种蔬菜瓜果等经济作物。如果没有大的政策调整(如大幅提高粮食作物的价格），那么这些地区粮食生产徘徊的趋势还将继续下去。”然而，东北平原，尤其黑龙江的原有农业现代化基础好，大水利、大农机等现代化建设很成功。同时，中低产田和荒漠面积大，农业生产可挖掘的潜力大。因此，他建议调整农业生产布局，通过财政投入、农田水利、农机化建设和粮食购销等特殊政策，给予相应的优惠和支持，把东北平原生产潜力发掘出来，使其成为中国未来的最大粮仓。[[[18]](#endnote-13)]

三、宏观发展战略是陆先生粮食问题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粮食生产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它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有着非常重要地位。中国历朝历代皇帝拜天，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现代以来，政权稳定的前提也是解决人民吃饭问题。共产党能够取得新中国的政权也是很好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新时期，粮食安全已经提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地位。作为三农问题研究的专家，陆先生对粮食问题研究的出发点恰恰是看到了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他曾谈到：“要求农民跟共产党走，如果农民都吃不饱饭，还怎么跟共产党走。”所以，他就是从解决农民如何吃饱饭，确立党的执政地位这个出发点来研究粮食问题的。因此，不论粮食丰收、欠收，他都一如既往的强调粮食生产的重要性。他说：“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历朝历代都把粮食问题作为安邦定国的头等大事。”[[[19]](#endnote-14)]“ 要解决农业徘徊的问题，……要重申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把农业放在基础产业的位置上 。”[[[20]](#endnote-15)]“ 粮食棉花的生产是重点，是大头，特别是粮食多年的经验是：粮棉丰收，则天下太平，若粮棉出了问题，则社会不安 。”[[[21]](#endnote-16)]

为了保证国家粮食生产的重要地位，针对城市化对农业用地侵占问题，陆先生强调：“要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现在有些人在鼓吹可以突破这条红线，这是很不负责任的，是在为商人的钱袋说话，是在鼓动一些人继续向农民抢地、夺地。所以下一步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向城市改革学习，要从明晰耕地的产权做起，明确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也是物权，农民有了保护耕地承包权的权力，才能阻止世纪之交以来滥占、乱占耕地的邪风，18亿亩耕地的红线才能保得住。”[[[22]](#endnote-17)]由此可见，不论何时，也不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何种阶段，陆先生对粮食在国家宏观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他都不断强调，一直呼吁不能放松粮食生产，不能忽视粮食的重要地位。

2000年以后，随着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的逐步加大，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定程度上对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带来了负面影响。当农民发现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到城市从事非农就业）越来越高，而粮食价格不能同步提升时，农民越来越多地放弃粮食生产。以一家一户的小农家庭农业生产变成了留守老人农业，或是一些农田抛荒。虽然有些耕地上种植了农作物，但由于没有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管理等，农业生产处于低效率状态。[[[23]](#endnote-18)]这说明农业生产面临着比较大的风险。在这种背景下，2012年，他考察了黑龙江农垦总局，指出：“把东北建成中国未来的大粮仓，这是国情、粮情发展的必然要求。既有需要，也有可能。”“这是农业生产布局方面的一项重大战略，需要从长计议，需要多方调研，制定相应的战略方针，任务和实施方案。”[[[24]](#endnote-19)]陆先生在城市化推进到一定程度，粮食生产通过一家一户小农生产已经不适应国情的背景下，明确提出了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的粮食生产模式，建议从长计议，把调整农业生产布局作为一项重大战略。这样宏观发展战略又成为他粮食问题研究的落脚点。

四、陆学艺粮食问题研究对新时期粮食安全的启示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国肆虐，全球化国际形势和世界贸易体系必然会受到很大影响。世界各国纷纷强调经济主体性，尤其是发达国家大力倡导制造业回归，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寻求自我产业链完整，大有逆全球化或是去全球化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粮食能否完全自给？是否存在对国外农产品的过分依赖？我国在粮食供给紧平衡、结构性矛盾突出的现实背景下，如何保障粮食安全？梳理陆先生的粮食问题研究给我们带来以下几点重要启示。

第一，粮食安全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社会稳定的战略地位一刻也不能放松。

目前,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粮食生产数据来看，我国粮食自给从量上来看是安全的。但是我国粮食生产供给平衡也是处于紧平衡状态，而且随着人们粮食需求结构的变化，粮食供需之间结构性矛盾凸显，有些结构性供给缺口还很大。同时近年由于农业生产机会成本上升等原因导致粮食价格国内外倒挂、进而带来粮食对外依存度趋高的现实。这就需要我们在新时期更要高度重视粮食安全的基础性地位。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确保粮食安全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粮食生产要稳字当头，稳政策、稳面积、稳产量。强化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2020年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要保持基本稳定。由此可见，确保粮食安全战略从中央文件来看是与时俱进，能够从新时期面临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上更加重视粮食安全的重要战略地位。但是重要的文件精神是否能够真正落实？如何落实？因此，各地要有一系列政策支持，确保粮食供给绝对安全。

第二，新时期确保粮食安全如何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为保障粮食安全，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进一步完善农业补贴政策。调整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稳定农民基本收益。”陆先生也是通过确保农民利益，调动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确保粮食生产的。但是由于近年农村推进土地流转，粮食种植机械化和规模化，粮食种植主体多元化。同时，新时期受疫情影响，城市就业机会减少等影响，一部分农民工回乡寻求就业机会。农民（粮食耕种者）主体分化，如何保障农民利益？保护哪一部分农民利益？就成为了新时期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保护家庭农场、农村合作社？还是保护个体小农（老年农业耕种者）、抑或回乡农民工？是直接给他们发粮食种植补贴？还是通过提供农业信贷优惠的资金支持？支持谁、怎么支持不仅是关系粮食生产方式的选择，如是现代还是传统？是规模化还是小农化？是集约化还是粗放化？还关系着农业生产内部结构的调整问题，是生产粮食作物还是生产农业经济作物？笔者在辽西平原的调研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等，租种流转土地主要是通过种植农业经济作物才能有所收益。如果流转土地生产粮食，哪怕全是机械化也会亏本。农民给我算了一笔账：当地旱地流转一亩地平均成本大约600元，加上种子、化肥、农药、人工或是机械化耕作的成本，大约近1000元，按亩产1000斤计算，玉米市价0.9元，每亩收益仅900元。农村恰恰是没有流转的少量家庭承包土地，由老年农民在不计人工成本的前提下，通过社会化农业服务购买（机械化）耕种粮食。这样的粮食生产一方面体力投入很少，另一方面也满足他们农村生活的人生价值。调查表明一旦有500-600元农业大户租种他们的承包地，这些农民也非常愿意租出去。他们认为这比自己种粮食收益多。这也反过来说明如租种土地来种植粮食是赔钱的现实。因此，新时期，保障粮食安全，到底补贴谁、支持谁，如何支持是首先要明确的问题。

第三，新时期确保粮食安全如何协调粮食相关利益群体的关系。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就业机会减少，城市居民也会面临收入下降，生活压力加大的问题。保障粮食安全，调动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提升粮食价格，这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人们收入逐步提高情况下是不会有问题的，顶多会带动CPI的上升。但是在新时期，城市居民收入下降，如果粮食价格上涨必定会带来一部分人口生活困难。那么，新时期，如何协调粮食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同时，按照以往的经验，粮食丰收时，各地粮库都不急着收粮，农民不得不降价出售。而粮食欠收时，粮食储备部门和粮食经销商又都大肆收购，而农民惜售的情况也会大量存在。如果新时期要求我们对外粮食依存度降低，那么这种情势只能会更为严重。因此，如何协调粮食生产者与粮食消费者的利益，如何协调粮食生产者与粮食经销者的利益，如何协调粮食经销者与粮食储备者之间的关系等多种利益关系就会变得更为敏感。因此，国家一定要制定相关政策组合拳，调整好各方利益，保证粮食安全。

第四、新时期如何平衡粮食安全战略和农业现代化的关系。

十八大以来，我国明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和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两个战略是一体两面的，推进农民工的城市化，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推进现代化、规模化、集约化的现代农业。这也是陆先生提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但是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全球经济都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原来发展战略的前提发生了变化。农民工就业比较集中的小型民营企业、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是最为明显会受到疫情影响的，目前很多小型民营企业面临倒闭风险，农民工城市就业困难，势必会回归农村，而家庭承包的几亩土地是其能够保障生存安全的一个根本。回乡农民工为了提高农业收益，是否会种植经济收益较低的粮食？是否还会有那么多的农民流转土地？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协调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与粮食安全之间的张力？如果农民工回归农村，回归农业，国家粮食安全的生产策略要如何调整？这也是陆先生从发展战略高度研究粮食问题带给我们的启示。

1. “农业部：我国粮食是产量丰、库存足，没有必要去抢购囤积”.21世纪经济报道.20200404

https://finance.sina.cn/2020-04-04/detail-iimxyqwa5069666.d.html?vt=4&wm=2277 [↑](#footnote-ref-0)
2. 参考文献

[]陆学艺.“三农”续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3.51. [↑](#endnote-ref-0)
3. [] 陆学艺.农村第一步改革的回顾与思考[J].社会科学战线.2009（01）：1-20 [↑](#endnote-ref-1)
4. ﹡ 该文获得该刊1980－1984年中青年作者优秀论文一等奖。 [↑](#footnote-ref-1)
5. [] 陆学艺.农业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J].农业经济丛刊.1986（05）：5-12 [↑](#endnote-ref-2)
6. [] 陆学艺.我国农村当前面临的几个问题[J].改革.1989（02）：125-134 [↑](#endnote-ref-3)
7. [] 陆学艺.农村改革、农业发展的新思路——反弹琵琶和加快城市化进程[J].农业经济问题.1993（07）：2-10 [↑](#endnote-ref-4)
8. [] 陆学艺.农村改革、农业发展的新思路——反弹琵琶和加快城市化进程[J].农业经济问题.1993（07）：2-10 [↑](#endnote-ref-5)
9. [] 陆学艺.1995年粮食棉花生产形势分析[J].改革.1995（02）：55-57 [↑](#endnote-ref-6)
10. [] 陆学艺.“三农”续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3.60. [↑](#endnote-ref-7)
11. [] 陆学艺.农业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J].农业经济丛刊.1986（05）：5-12 [↑](#endnote-ref-8)
12. [] 陆学艺.四十年农业发展的基本经验和教训[J].中国经济体制改革.1991（02）：21-26 [↑](#endnote-ref-9)
13. [] 陆学艺.中国农民，养活中国[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1995(03):11-13 [↑](#endnote-ref-10)
14. [] 陆学艺.“三农”续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3.55-56. [↑](#endnote-ref-11)
15. 指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和海南 [↑](#footnote-ref-2)
16. 指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 [↑](#footnote-ref-3)
17. [] 陆学艺.“三农”续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3.62. [↑](#endnote-ref-12)
18. [] 陆学艺.“三农”续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3.67. [↑](#endnote-ref-13)
19. [] 陆学艺.中国农民，养活中国[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J].1995(03):11-13 [↑](#endnote-ref-14)
20. [] 陆学艺.四十年农业发展的基本经验和教训[J].中国经济体制改革.1991（02）：21-26 [↑](#endnote-ref-15)
21. [] 陆学艺.1995年粮食棉花生产形势分析[J].改革.1995（02）：55-57 [↑](#endnote-ref-16)
22. [] 陆学艺.“三农”续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3.54. [↑](#endnote-ref-17)
23. [] 张斌. 我国农村耕地抛荒问题探讨[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01(06):363-6. [↑](#endnote-ref-18)
24. [] 陆学艺.“三农”续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3.67.

**作者简介：**

杨桂宏，女，1972年生，辽宁省人，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教授、北京市社会管理研究基地研究人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发展。 [↑](#endnote-ref-19)